

■ 城市考古

南海卫城墙遗址：打造基建考古保护利用新范例

南海卫城墙遗址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街道西正路与运河东二路交汇处,毗邻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迎恩门城墙,面积约15000平方米。2023年下半年在配合“东莞记忆”项目迎恩门记忆墙工程建设中,依据“先考古后建设”原则,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时发现,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发掘3000平方米。2025年1月,该考古发掘项目通过广东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验收。遗址文化遗存丰富,清理出土明清时期的城墙基址及城外道路、排水系统等配套设施,城内房屋基址、水井等生活设施,并出土了宋至民国的建筑构件和生活器物。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东莞古城遗址考古的空白,实证了东莞作为“粤海第一门户”在明代军事海防体系的重要地位以及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历史价值,是考察和研究明代广东军事海防体系、海丝贸易保障及东莞县城建置沿革的重要资料,为珠三角地区乃至岭南沿海城墙建筑史、城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宝贵实物例证。

践行“先考古后建设”,正确处理保护传承和利用发展的关系

坚持文化遗产保护优先。近年来,东莞在历史城区莞城街道积极推进“东莞记忆”项目,打造迎恩门城墙公园,建设两层地下停车场和地上一层建筑。市文物部门按“先考古后建设”的原则,提前介入,协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勘探和文物保护工作,发现了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南海卫城墙和城内古建筑遗迹。遗物,是东莞作为海丝重要节点、对外贸易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的重要见证,为珠三角地区乃至岭南沿海城墙建筑史、城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宝贵实物例证,是重要的考古发现。市文物部门及时与城建部门沟通,积极向市委、市政府汇报,阐明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及在历史城区发现明代城墙遗址的重大意义,引起全市上下高度关注。东莞市决定取消建设计划,保护文物免遭建设工程破坏,开展进一步考古发掘,并谋划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加强城市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凝聚文化遗产保护共识。南海卫城墙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赓续文化血脉、传承中华文明、增强市民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2025年2月25日上午,东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会议,创新采用“实地调研+辅导报告”的方式,组织市四套班子领导到南海卫城墙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实地调研,并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莞窑洞举办“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专题辅导报告会,市委主要领导部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着重强调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先考古后建设”原则,防止建设性破坏事故。会议视频连线市行政办公中心以及各镇街(园区)36个分会场,覆盖全市约4000名领导干部,凝聚全市党员干部的思想共识,打好文明传承、文化延续重任。



南海卫城墙遗址平面图

坚持“保护第一”,用科学方法筑牢文物保护根基

落实保护措施和资金保障。由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要负责考古发掘研究,后续的考古遗址现场保护需由地方政府承担。东莞市委、市政府落实“原址保护”原则,在考古发掘结束后落实属地管理职责,对遗址现场实施安全围挡和严格管控,安装全方位监控系统并与公安部门联动;安排保护资金,委托专业单位编制《迎恩门城墙遗址临时保护措施及维护服务设计方案》并经广东省文物局批准同意后实施,为后续活化利用奠定坚实基础。

因地制宜应对环境挑战。遗址所在区域地下水位高,春夏天暴雨天气频繁,且市政排水管道密布并贯穿其中,存在多种积水来源问题,对土质遗址的保护挑战较大。为此,东莞委托专业团队制定完善的保护措施。针对天上水,在重要遗迹上方修建临时保护棚及挡水坎,对其他遗迹结合后期展陈需要进行可逆性临时回填;针对地下水,建立主动式地下水管控系统进行集水抽排,实时监测并动态调整设施布置及抽水策略;针对市政排水管道侧壁水渗透,进行废弃管道防渗处理及封堵、更换封闭式排污管道并回填。为确保遗址本体安全,对遗址土质、砖石质、木质等不同材质遗迹开展14项保护性试验,选取最佳保护效果的病害治理措施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同时全面系统进行遗址防治监测和维护,为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奠定基础。汛期对遗址采取临时覆膜、定期抽水等措施,降低暴雨对遗址的持续影响,预防突发事件。

加强专家智力指导和支撑。东莞市多次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或论证会,邀请国内知名考古学、历史学、文物保护、城市规划等领域专家,为遗址的价值阐释、学术研究、保护技术、展示利用方案等提供专业指导,确保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性,为后续工作指明方向。协同“四普”工作提升保护等级。南海卫城墙遗址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的重要考古新发现,接下来将根据“四普”工作安排依法提升文物保护等级,加大保护力度。

实现社会共享,通过考古成果“出圈”赋能历史文化传播

高规格权威发布考古成果。2025年2月25日,东莞市政府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市委分管领导进行主发布,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要负责人介绍考古成果,同步发布新闻稿、宣传视频,第一时间向公众全面、权威地展示其考古成果及价值,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央媒省媒及行业媒体重点报道96篇,发布后五天内网络互动声量超622.8万次。通过对南海卫城墙遗址考古成果的广泛宣传,重塑了外界对东莞作为工业制造业名城形象,提升了群众对东莞历史文化的认知,对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参与度,凝聚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加强遗址阐释,讲好东莞故事。围绕考古考古,莞城街道立足迎恩门及南海卫城墙遗址价值,创新设计多种文化体验产品,开发“邀你登迎恩门,观南海卫城墙遗址”系列城址主题游览路线,组织群众登上迎恩门,近距离观看南海卫城墙遗址,介绍考古知识和成果,特别是在青少年儿童的专场活动中增加手账创作环节,让青少年儿童通过贴纸和画笔将遗址融入手账,从纸上“活起来”。

在保护中传承,打造可持续发展的考古遗址公园

高水平规划遗址公园。东莞立足考古发掘成果,邀请国内高水平专业团队,持续深入研究遗址价值,整体规划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原址展示、数字化复原、互动展览等方式,打造一座集中展示东莞城市发展历史、古代中国海防体系,兼具历史教育、生态涵养、休闲游憩、城市文化门户等功能的复合型城市考古遗址公园,呈现海防历史与城市发展脉络;同时结合研究成果制定考古发掘计划,开展公众考古,增强市民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与参与感。

融入区域统筹活化。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将围绕迎恩门节点进行展开,联动南侧西城楼公园及周边历史文化街区(如中兴路—大西路历史街区)等资源,将其纳入城市历史文化展示体系中统筹规划推进,使之成为认识东莞的地理标识,唤起东莞历史记忆、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场所,进一步彰显特色文化形态,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执笔:陈靖云 田恬)

考古津城：因河而城，应时而兴

刘玮 郝园林

天津,城市发展历史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津派文化”。既往天津城市史研究多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展开,集中于明清时段,难以完整展现其更早的城市历史。

近年来天津开展了系列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如军粮城唐代遗存、元代河西务十四处遗址、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等。自2017年起,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先后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对天津地区现存的18座古代城址开展区域系统调查与勘探。这些工作,特别是系统调查,深化了对天津古代城址年代分期、空间分布、地表遗物与城址现状的认识,为研究其发展历程提供了科学依据。

河流既提供水源与水运之利,亦带来水患威胁。部分城址因海侵或河流泛滥废弃,如汉代西约台故城或毁于汉代“海溢”。面对自然挑战,古人发展出独特的应对策略。如天津卫故城通过多次重修城墙、设护城堤防与排水水闸以应对水患。河流虽然带来挑战,但社会和自然造就的天时地利之时势,促成了天津城市的勃兴。

应时而兴

考古发掘和调查进一步明确天津城市历史发展的脉络。根据采集遗物、城址形态,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以及文献可知,已知最早城址可追溯至战国,最晚下迄明清时期。18座城址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战国5座、汉代8座、唐代2座、辽代1座、明清2座。统计显示天津城市发展大概有两个高峰,分别为战国至秦汉与辽金元明清时期,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同步。

战国时期,天津北部为燕国的控制地带,燕筑秦城遗址,设右北平郡。南部系燕、赵、齐三国的争夺地带,西约台村遗址和纪庄子遗址发掘出土的陶文和刻划符号可为证。

秦汉时期,郡县制全面实行,天津地区迎来城市发展首个高峰期。旧有秦城遗址在秦灭燕后为秦人所控,入秦后继续沿用,直形道路结构。与此同时,大批新的城邑得以兴建,包括静海西约台城、程庄子城、泉州故城(采集到“泉州”字样陶盆)、大海北城、大官城、大台子、无终县故城等。据考,无终县故城应为右北平郡新郡治,静海西约台城址是东平舒县治,泉州故城为泉州县县治。此期城市政治属性突出,与先秦时期一脉相承。进入东汉魏晋时期,大量遗址逐渐遭废弃。

隋唐时期是天津城市发展的过渡阶段。据调查,这一时期新建城池仅有武清旧县故城及军粮城遗址。后者据“三会海口”要冲,为重要的海运运输地和产盐地,凸显其漕运枢纽地位。

辽金至元明清时期天津城市发展迈入第二个高峰。金王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后改中都,至此结束了海河南北自宋开始的对峙局面。元建大都,京都所需粮食多仰仗江南供给,因此天津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海漕、河漕兴盛直接推动天津城镇发展。河西务十四处遗址的考古工作实证天津成为运河漕运关键节点,为研究元代漕仓制度提供重要考古资料。

明永乐建都北京后,设天津卫是天津城址建设成熟的关键节点。天津卫的设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布局紧密相连。通过分析天津卫故城的空间布局、城墙结构等遗迹与出土文物,并结合文献资料,发现其城墙周长逾4900米,城内呈十字形街结构,兼具军事防御功能与规划特征。雍正三年(1725),天津先后经历了撤卫到升州为府,设天津、静海等六县一州,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央派出机构在此设立。明清武清县故城的城墙周长亦逾4000米,存有十字形街道。至此,天津城市的功能由军事防御拓展至行政、商业等多元领域。

天津古代城址的考古工作揭示其“因河而城,应时而兴”的独特发展历程。“因河而城”揭示了水文环境作为自然基础,为城市提供水源、交通与防御等多重功能。“应时而兴”反映城市对不同历史时期时代机遇的把握与适应。从战国秦汉的第一次城市发展高峰,到辽金元明清时期的第二次高峰,天津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始终与国家政治格局的演变、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水运漕运的兴起密切相关。从战国时期的城邑萌芽,到明清时期的城市繁荣,天津的城市发展始终与河流的滋养和时代背景的变迁紧密相连。

未来天津城址研究的持续推进,仍有赖于专题性的调查、勘探及发掘的进一步深化。天津古代城址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该地区城市发展历史,并揭示华北平原乃至中国古代城市史进程。

【本文为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GIS支持下天津古代城址的考古调查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24SK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叩醒城市记忆 重焕文脉新生

——杭州市探索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创新实践

杭州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八千年跨湖桥文化到五千年良渚文化的史前文明曙光,又历经吴越国首府和南宋建都,杭州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来,杭州市在实践中探索考古前置长效机制,深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相映成趣,不断展现古都杭州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文化担当。

先行先试,在实践中探索长效机制

2009年起,杭州市就在城区和余杭区等地开展建设前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试点工作。2014年起,鉴于有些土地在出让后发现地下文物造成退地纠纷,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和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协商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前置到土地出让以前,逐步在全域推进。按照《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要求,对涉及地下文物区域和用地五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项目地块开展考古前置工作。

2021年,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践出台《杭州市经营性土地考古前置工作指南(试行)》,全方位推进经营性土地考古前置工作,非经营性用地后续也逐步纳入到考古前置工作中。2023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后,2024年杭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杭州市加强考古前置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在土地储备(出让)或划拨前,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文物遗存保护等工作,全面推行考古前置。2025年,杭州市园文局编制《杭州市考古前置工作指南》,对涉及考古前置地块的工作内容进行全流程梳理,进一步优化工作机制。经过长期的探索,杭州已逐步实现全城考古前置工作,2024年全年杭州完成考古调查项目1329宗,涉及调查面积5200万平方米;完成考古勘探项目373宗,涉及勘探面积约1040万平方米;完成考古发掘项目56项。

系统谋划,在改革中深化相应制度

一是提高保护意识,明确各方职责。通过上门服务,建立市、区(县)两级协调联络机制,宣传考古前置的法律依据和工作要求,加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考古前置工作的认识。促使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听取考古前置相关报告,研究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明确各区、县(市)政府考古前置工作主体责任和文物、土储或建设单位的直接责任,压实文物保护工作职责。

二是建立协同机制,保障项目建设。推动各区、县(市)政府建立多部门参加的考古前置工作协同机



公众参与



富阳新登古城遗址

制,协调处理考古前置与土地出让(划拨)、城乡建设的关系。文物部门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加强考古前置工作的计划性,通过与各区、县(市)政府联动编制年度考古发掘计划等方式,集中力量破解考古发掘项目过多与考古发掘力量不足的矛盾,对于部分省市重点项目,建立专班,全力保障。

三是充实考古力量,优化工作效率。加强市、区两级文物部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2018年杭州市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从15人增加到25人,2020年扩充至50人,并逐步实现满编运行。市属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等地下文物资源较为丰富的区域,通过多种方式培育引进考古专员,加强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利用力量。加强文物普查及专项调查工作,组织开展区域考古调查和评估等工作,借助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机遇,全面梳理杭州历史文化资源情况,提升考古前置工作效率。

科技赋能,在数字化中实现全链条管理

一是搭建智慧考古平台。通过数字化改革攻坚,2022年起杭州市园文局建设启用“考古一件事”数智考古系统,打破线下办理流程分散问题。系统中构

建起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全流程机制,建立申请单位—区文物部门—考古发掘单位—市文物部门的协同办理机制,透明办事流程和各方责任,压缩不必要审核流程,实现信息互通,减少服务对象等待时间,大幅提高考古前置工作效率。

二是建立“考古一张图”。推动考古前置项目“一张图”建设,锚定南宋临安城复原、良渚文化研究等重大课题,构建杭州市考古地理信息体系。将全市地上文物和地下文物埋藏区信息导入系统,在办理考古前置过程中及时发现地上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前置文物资源情况,有效保障“先考古后出让”制度落实,确保文物安全。

三是推动考古发掘全流程管理。建立考古工地和出土文物管理系统,涵盖现场记录、档案登记、标本管理、报告编制、出土文物流转等模块。推动考古过程可追溯、可验证,实现考古成果的规范管理和高效利用。

成果惠民,在创新中优化协同机制

一是坚持服务意识,不遗余力保障地方发展。市文物部门成立考古前置服务专班,由市园林文物局牵头建立领导之间、处室与区县部门之间、考古工作经历人员之间不同层级的沟通机制,加强与各区县政府、部门的沟通对接,及时解决考古前置问题。对考古前置项目采取重点、实时这个跟进、大型项目尽早介入的方式,着力保障省市重点项目、民生工程和重大产业项目,通过原址保护等多种思路,合理配置考古发掘力量 and 项目安排,大大缩短考古前置工作时间,实现高效推进。

二是聚焦考古价值,因地制宜保护发现文物。利用考古前置契机,全面梳理南和临安城、钱塘江海塘等重要地下文物分布情况,实现城市建设发展与考古前置工作良性互动。推动重要考古发现成果转化,建成开放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临平古海塘博物馆等专题博物馆,推动衣锦城、西州造纸作坊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打造地方文旅发展重要地标。

三是创新参与路径,久久为功推动公众考古。多种形式丰富公众参与考古工作,举办“文物普法进企业”等活动,广泛宣传考古前置等工作。结合杭州本地高校课外实践等课程,组织师生深入参与考古发掘现场,探索考古发掘工作内容。举办展览呈现杭州考古成果,2013年起杭州市文物部门连续十余年举办年度考古工作盘点和“发现杭州”考古成果展等公众活动,以多种途径宣传考古发掘成果。对部分关注度较高的考古项目,通过现场参观、举办讲座等方式,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执笔:胡选哲 周宜静)